

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研究^{*}

罗 中

(吉首大学 哲学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元代在武陵山区的土官行政建制,是一种将民族与地域混合为一体的特殊行政区划管理模式。安抚司行政建制的象征性控制、地方蛮夷官的实质性自治、溪洞社会组织的完整性延续,成为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的基本构架。这种管理模式侧重于“溪洞”群落单位的基层组织管理,忽略于“溪洞”群落所属人口的管理,导致了所谓的“诸部蛮夷”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的编户之民。为防止溪洞蛮夷的反抗,军政一体的安抚司只能长期保留,从而使国家规范的行政建制无法在武陵山区设置,以至使这里成为规范行政建制的空白。

关键词:元代武陵山;安抚司;蛮夷官;洞寨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7)06-0129-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MZ046)

作者简介: 罗 中,女,博士,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

引用本文: 罗 中. 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研究[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8(6): 129-135.

土司制度的发展,经历一个由“土官”到“土司”的流变过程,而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具有这一流变过程的早期典型体现。武陵山区位于湖广行省西隅,在蒙古政权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因其复杂多样、易守难攻的地形,及“诸部蛮夷”的顽强抵抗,使蒙古军队难以完成对这一地区各民族的彻底征服,导致规范的路、府、州、县行政建制难以推行,只能实施“蛮夷自治”的“土官制度”。因此,安抚司行政建制的象征性控制、地方蛮夷官的实质性自治、溪洞社会组织的完整性延续,成为武陵山区元代土官行政建制的基本构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对土司制度始立于元代,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安抚司行政建制的象征性控制

研究元代行政建制,《元史》卷58《地理志》·

序》是不可不读的史料,其文曰: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初,太宗六年甲午,灭金,得中原州郡。七年乙未,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

^{*} 收稿日期:2017-09-13

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宪宗二年壬子,又籍之,增户二十余万。世祖至元七年,又籍之,又增三十余万。十三年,平宋,全有版图。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奇。于是南北之户总书于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千九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藩,执臣礼惟谨,亦古所未见。地大民众,后世狃于治安,而不知诘戎兵、慎封守,积习委靡,一旦有变,而天下遂至于不可为,呜呼!盛极而衰,固其理也。

唐以前以郡领县而已,元则有路、府、州、县四等,大率以路领州、领县,而腹里或有以路领府,府领州,州领县者,其府与州又有不隶路而直隶省者,具载于篇;而其沿革则泝唐而止焉。^{[1]1 345-1 346}

细细解读该序,至少有3点信息与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有着密切联系:其一,太宗、宪宗、世祖的4次籍民,“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其二,“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其三,行政建制“有路、府、州、县四等”外,还有“安抚司十五”。

安抚司是元朝重要的行政建制之一,这种特殊的行政建制,是在蒙古军队统一的进程中,因征服地域的逐渐扩大,随着军队的陆续推进而相应设立的。例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进兵岳州,摄四翼镇抚朱国宝领兵攻战,“既降湖右,加宣武将军,统蒙古诸军,镇常德府,知安抚司事”^{[1]3 877}。至元十四年(1277年),朱国宝“会诸道兵攻广西静江,拔之,进秩管军万户,镇守梧州,领安抚司事”^{[1]3 877}。至元十五年(1278年),朱国宝率军南下攻克南恩、新州等地,于十六年“迁定远大将军,海

北南道宣慰使”^{[1]3 877}。从朱国宝的任职中,即可看出安抚司是在被征服地域最早设立的行政建制,具有军政同理的临时机构性质。这类建制一般是由完成该地征伐任务的主要将领或军事官员担任安抚使,统筹安排该地区军政事务。其作用,是在军事平定之初,承担新征服地区的镇守戍防、维持战后社会秩序、安抚招谕民众归顺等。根据《元史·地理志》记载统计,元代初期在全国共设立了46个安抚司,涉及中书省及河南江北、四川、云南、江浙、湖广等行省。

安抚司最早设立于云南行省,元世祖“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二年,立安抚司以统之”^{[1]1 483}。“敕以贺天爵为金齿等国安抚使,忽林伯副之,仍招谕使安其民。”^{[1]73} 其次是中统三年(1262年)设于中书省的棣州安抚司,但棣州安抚司于至元二年(1265年)即废除,是元最早废除的安抚司。设立安抚司最密集时期,是至元十年到至元十五年之间。在这一时期内,河南江北行省设有6个、四川行省设有4个、江浙行省设有7个、湖广行省设有27个。

随着元朝统治的日渐稳固,在统一规范的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于各地相继设立后,具有战后临时机构性质的安抚司,从至元十四年起至元十七年之间,基本上被逐一废除。因而就全国大多数地区而言,安抚司存在时间都十分短暂,有的仅仅设立一年即废。如至元十三年建立的江浙行省江阴、台州、龙兴等安抚司,次年即被江阴路、台州路、龙兴路所取代。至元十二年在武陵山周边地区设立的湖广行省常德、澧州、沅州等安抚司,均于至元十四年被常德路、澧州路、沅州路所取代。延续时间较长的四川行省邛州安抚司,于至元二十一年最后废除时,存在也仅仅7年(见《元史》卷58至卷63,《地理志》一至六)。以上所述的这些安抚司,除金齿等处安抚司外,其他大多建于“腹里”,都是普遍性的设立,并不具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而言的安抚性质。

具有安抚少数民族性质的安抚司,并没有因地区统治的稳定而被废除,或者说因军事征服没有完全结束而继续存在。《大元混一方輿胜览》记载了元初至大德年间(1297年至1307年)的安抚司,有罗番遏蛮军安抚司、程番武盛军安抚司、金石番太平军安抚司、卧龙番南宁州安抚司、小龙番静蛮军安抚司、大龙番应天府安抚司、洪番永盛军安抚司、方番河中府安抚司、卢番静海军安抚司、葛蛮安抚

司、琼州安抚司、南丹州等处安抚司、都云定云等处安抚司、永顺保靖南渭三州安抚司、安抚高丽总管府、新罗国安抚司等,共计16个。其中安抚高丽总管府、新罗国安抚司是因征伐需要,由临时设立的“镇东行省”统辖外,其余14个安抚司全都设于武陵山区及其以西地域,均属湖广行省管辖。《元史·地理志》所载至元末仍存的安抚司共有17个,其中9个与《大元混一方輿胜览》中建于元初安抚司的名称一致。其余的安抚司,有的存在着明显的延续关系,如葛蛮安抚司与新添葛蛮安抚司、南丹州等处安抚司与庆远南丹溪峒等处军民安抚司,其名称大致相同,所辖地域也相差无几;有的是一种分设关系,如永顺保靖南渭三州安抚司与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保靖州安抚司;有的则是地域没变,但名称改变,如琼州安抚司改名为乾宁军民安抚司;有的却是新设立的,如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播州军民安抚司、思州军民安抚司等。在元末仍存的17个安抚司中,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师壁洞安抚司属于四川行省,其余均属于湖广行省。这17个安抚司,其中11个属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播州军民安抚司属沿边溪峒宣慰司管辖,其余5个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自元初设立至元末仍存的这些安抚司,与武陵山区紧密关联的有葛蛮安抚司及新添葛蛮安抚司、永顺保靖南渭三州安抚司及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师壁洞安抚司、思州军民安抚司、播州军民安抚司等。

至元十三年,南宋灭亡,时任播州安抚使的杨邦宪,“世祖诏谕之,邦宪奉版籍内附,授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1]384}。这是时间明确的最早在溪峒地区设置的安抚司,开创了在武陵山区招抚族群归附的先例。其后,各蛮夷酋长纷纷率部归附。至元十四年五月,“诏谕思州安抚使田景贤,又诏谕泸州西南番蛮王阿永、筠连、腾串等处诸族蛮夷,使其来附”^{[1]190},任命田景贤仍为思州安抚使,奠定了思州安抚司的基础。“元初,彭思万内附,赐印章,授武德将军。思万瞽弟胜祖袭,胜祖子万潜自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见张天如:《永顺府志》卷9《土司》),奠定了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成立的基础。

播州军民安抚司,至元十二年十二月置,初隶四川行省,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升为播州宣抚司,隶沿边溪峒宣慰司,仍属四川行省。治所穆家川在今贵州省遵义市区内,辖境相当于今贵州省遵

义市所辖各县,并向东延伸至今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保靖、花垣、永顺等县。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随沿边溪峒宣慰司改属于湖广行省。播州军民安抚司下有沿河祐溪等处,介于武陵山中心向边沿过渡区域。

思州军民安抚司,至元十二年十二月置,初隶四川行省。治今贵州省凤冈县龙泉镇,辖境大致包括有今贵州省铜仁市的各县,黔东南自治州的镇远、台江、锦屏、剑河、黎平等县,湖南湘西自治州的永顺等县。至元二十九年,思州安抚司一度升为宣抚司,改隶湖广行省,但元中后期又复为思州安抚司。据《元史》卷63《地理六·湖广行省》“思州军民安抚司”条记载,属今贵州省的有沿河、祐溪、五寨铜人等处、铜人大小江等处;属今湖南省的有麦着土村、会溪施容等处、腊惹洞、驴迟洞等,都位于武陵山中心地区。

永顺保靖南渭三州安抚司,元朝初期隶于四川行省,武宗至大年间(1308年—1311年),该司被一分为三。永顺州改设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仍属四川行省,治所在福石城,即今湖南永顺老司城,辖境为今湖南永顺、桑植、永定等区县及相邻地区。保靖州和南渭州则分别建制,并入湖广行省的新添葛蛮安抚司。保靖州治所为今保靖县迁陵镇,辖境相当于今湖南保靖、花垣、吉首、凤凰等地。南渭州治所为今永顺县芙蓉镇芷州村,辖境相当于今永顺、古丈、龙山等地。三州分设后,永顺保靖南渭三州安抚司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元史》卷63《地理志六》所载有南渭州、保靖州、白崖、柿溪州等蛮夷官,均位于武陵山中心地区。

新添葛蛮安抚司,至元十六年(1279年)设立,属湖广行省八番顺元宣慰司,治所在今贵州省贵定县沙坝村的新添司。新添葛蛮安抚司辖境十分广泛,其范围极不易厘清,大致拥有今贵州省贵定、龙里、都云、麻江、平塘等县,其东北部则延伸至湖南保靖、龙山、桑植等县。《元史》卷63《地理志六·湖广行省》“新添葛蛮安抚司”条下,记有南渭州、上桑直、下桑直、保靖州等各蛮夷官,均位于武陵山中心地区。

元朝在武陵山区设立安抚司后,也曾一度想以路取代安抚司,终因条件不成熟,不得已又将路改为安抚司。乾隆《永顺府志》卷9《土司》载:“元为诸部蛮夷,设蛮夷官。至元中置永顺路,后改永顺保靖南渭安抚司。至大三年,改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清晰记载了元朝在此的行政建制,经历了蛮夷

官→永顺路→安抚司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建制性质的改变,还有地域的缩小与权力的分化。永顺路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后,“会溪、施溶、腊惹、驴迟等处属思州军民安抚司。南渭州、白崖、保靖州等处属葛蛮安抚司”。而桑植县则于“元贞元年,升为慈利州,又置柿溪州,属澧州路。又上桑直、下桑直置蛮夷长官,属葛蛮安抚司”(见张天如:《永顺府志》卷 1《沿革》)。在路之下,又分设州与安抚司所辖的蛮夷长官司两类。这些举措,不同于内地将安抚司改为路的进展途径,而是反向将已设为路的正常行政建制,改为战时军政合一的安抚司。或者在路的管辖范围内,分一地域设立属安抚司管理的蛮夷长官司。这种逆向的行政机构设置行为,表明了元朝对武陵山区溪峒群落并没有完全的实现直接统治,仅仅只达到初步的掌控,还需要以震慑的军事征讨和怀柔的安抚招慰,使“溪峒”族群逐渐归附。而征讨与安抚的同时进行,只有具备军事和行政职能的安抚司才能承担。因而行政建制的逆向设置,是鉴于形势所需的不得已行为。直至元朝终结,安抚司一直存在于湖广行省偏西一隅,大多数执掌者又是当地蛮酋,说明安抚司的设置,作为朝廷地方政权存在的象征,远远大于直接统治的形式。

二、地方蛮夷官的实质性自治

《元史·地理六》曰:“湖广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三十、州十三、府三、安抚司十五、军三,属府三、属州十七、属县一百五十,管番民总管一。”^{[1]1 523} 这些名目繁多的行政建制,除了仍保留的 15 个安抚司外,其中的 22 个路及 5 个州都是由安抚司转设而来:如常德路“元至元十二年,置常德府安抚司。十四年,改为总管府”。澧州路“元至元十二年立安抚司。十四年,改澧州路总管府”。靖州路“元至元十二年,立安抚司,明年,改靖州路总管府”等^{[1]1 523-1 562}。

这些路、府、州、县行政建制,多沿武陵山边缘而立,并没有深入武陵山区。如北面有汉阳府的巴东县等;东北有岳州路的武陵县、桃源州及澧州路的石门县、慈利州、柿溪州等;东面有辰州路的沅陵县、辰溪县、泸溪县、溆浦县等;东南有沅州路的卢阳县、黔阳县、麻阳县等;而武陵山中心地域及其以西的行政建制,主要是八番顺元蛮夷官、管番民总管、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思州军民安抚司、播州军

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等军政合一机构,没有设置路一级行政建制。虽有极少的府、州、县等,亦属于蛮夷官执掌,与其统辖的地方自治管理的洞寨并列。

在《元史·地理志》“湖广行省”“四川行省”之中,记载了众多蛮夷官或诸部蛮夷。四川行省“诸部蛮夷条”下,有师壁洞安抚司、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以及石耶洞、散毛洞、驴迟洞、新容米洞等 34 处司、洞、寨。湖广行省“八番顺元蛮夷官”条下,有罗番遏蛮军等 9 个安抚司、木瓜狢狢等 3 个蛮夷长官及 1 府、5 州、11 县;“管番民总管”条下,有中槽百纳等处、底窝紫江等处 52 个蛮夷军民长官;“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条下,有雍真乖西葛蛮等处 24 洞寨蛮夷官;“思州军民安抚司”条下,有思印江等处、洪安等处、平头著可通达等处、溶江芝子平茶等处、五寨铜人等处、铜人大小江等处、会溪施溶等处,以及麦着土村、沿河、祐溪、腊惹洞、驴迟洞等 53 处蛮夷官,1 府、13 州;“播州军民安抚司”条下,有沿河祐溪等处 32 洞寨蛮夷官,1 府;“新添葛蛮安抚司”条下,有南渭州、上桑直、下桑直、保靖州等 132 处蛮夷官。

上述各蛮夷部落多且复杂,甚至相互形成交错领辖的局面。“驴迟洞”分别在四川行省“诸部蛮夷”及湖广行省“思州军民安抚司”中出现,跨了两行省。“沿河祐溪”则在“思州军民安抚司”与“播州军民安抚司”同时出现,跨了两安抚司。而地域之间更犬牙交错,互有你我。新添葛蛮安抚司地处今贵州省中部,但其下辖的南渭州、上桑直、下桑直、保靖州等远至今湖南省西北部。就当时的行政建置而言,越过了思州军民安抚司所属“元置五寨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道光《凤凰厅志》卷 1《沿革志》)的今凤凰等县、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等行政建置辖地,地域跨度之大令人惊讶,实则是遥领的几块飞地而已,并不能实质性地控制。就当时贵州本地而言,其行政建制辖区也飘移不定。“元为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四行省地,至元十六年,诸夷降附,置八番罗甸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及都元帅府于贵州。十九年,又以降夷八番金竹百万砦三万四千余户悉为都县,置顺元路金竹府贵州以统之。二十年,又以讨平地九溪十八洞为郡县,并立总管府,俱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初隶湖广,后隶云南,二十八年改隶四川,寻改隶湖广,而割普定以西隶云南焉。二十九年,中书省言地狭官冗,请合宣慰司都元帅府为一,从之。遂置八番顺元等处军民宣慰司都元

帅府,领万户府一、镇抚司一、安抚司一、散府二、长官司五、顺元思播宣抚司三。”(嘉靖《贵州通志》卷1《建置沿革》)不仅仅是行政管辖在三个行省中游移变动,其具体的地方管理官员也是由招抚的蛮夷酋长担任,元军并没深入其地。“至元十六年,潭州行省遣两淮招讨司经历刘继昌招降西南诸番,以龙方零为小龙番静蛮军安抚使,龙文求卧龙番南宁州安抚使,龙延三大龙番应天府安抚使,程延随程番武盛军安抚使,洪延畅洪番永盛军安抚使,韦昌盛方番河中府安抚使,石延昇石番太平军安抚使,卢延陵卢番静海军安抚使,罗阿资罗甸国遏蛮军安抚使,并怀远大将军、虎符,仍以兵三千戍之”^{[1] 539}。实际上是元朝以地方蛮夷官自治性的实质管理,间接地实现朝廷对这一地域的统治,因而其行政建制与其他地域的设置相比较,自然有不同之处。

三、溪洞社会组织结构的完整性 延续

所谓“溪洞”,史籍上亦记载为“溪峒”。从地理概念角度而言,“溪峒”是指在南方喀斯特岩溶地貌影响下,形成的溪流与山间盆地,体现着该区域独特的地理环境。从政治概念角度而言,“溪洞”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名称,体现了民族群落分布的地区特征。“溪洞”社会组织反映出了民族群落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即绝对的封闭地理环境中形成的相对封闭的民族群落聚居状态。

武陵山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自汉代后各王朝采用了“初郡”“羁縻州”等管理方式,利用土著部落“自相君长”的首领,对这一地区实行间接治理。至五代、两宋时期,各强宗大姓在武陵山区基本上奠定了各自区域性的统治地位。大致形成了川东(今渝东南)马氏、冉氏、杨氏等,鄂西覃氏、田氏、唐氏等,湘西彭氏、向氏、张氏等,黔东田氏、张氏、安氏等雄踞一方的割据势力。从而为元代设立安抚司,以蛮夷官治理洞寨的行政建制奠定了基础。

对于“溪洞”蛮酋的招抚政策,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即已推行。至元二十九年,世祖“降诏招怀溪峒蛮夷曰:中书省奏,金竹知府臆朮言:‘先奉圣旨,招谕平伐山齐皆主谗薛约定夺。今有居几地面百眼左、阿吉谷、各当、各迪等,自以外荒,久欲内附。乞颁圣旨,庸许自新。’朕嘉其诚,遂俞所奏,令谕尔众,咸听朕言:惟尔邻封,率多臣服,自番方而入贡,

寻万国以来庭。南顺丹州,北怀金竹;陈蒙烂土,顷已向风;新添葛蛮,久皆款化。咸膺宝命,仍佩金符,赏赉有加,官守如故”(苏天爵:《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八番顺元诸蛮》)。显然,此时已确立了对各洞归附蛮酋“赏赉有加,官守如故”的原则。溪峒地区的民族归附后,元朝并没有打破原有的“溪峒”组织结构,而是采取“诸安抚大抵皆直隶行省,或即以其官为宣慰,而不别设节制之官”(《续文献通考》卷233)的方式,由安抚司统辖各蛮夷官,蛮夷官统辖各“溪洞”的管理体系实行间接治理,形成安抚司→蛮夷官→溪洞各寨的管理体系。元朝的直接统治势力,并没有完全深入武陵山腹地。虽然在王朝层面设立了安抚司,宣示这一地区纳入了元朝版图。但路、府、州、县正常的行政建制并没完全设立,最基层的社会管理,仍由蛮夷官掌控的传统“溪洞”组织承担。如湘西地区的腊惹洞、驴迟洞、麦着黄洞、宋沱洞、乌引洞、芦荻洞、泊崖洞、杜望洞等;鄂西地区的又(叉)巴洞、散毛洞、容美洞、大小盘洞、师壁洞等;鄂湘交接处的捏坪、蚕寮、苦竹、板山、柘山、金藏、司地、美坪、夹石、烂岩、黄家铺、大那、朝那、那步、阿者、谢家、鱼龙、孟迷等18洞;川东南的邑梅洞、平茶洞、石耶洞、酉酬洞、打袄家洞、宋农洞、巴息洞、容坪洞、感坪洞、地隆阡洞等;黔东北的市北洞、楠木洞、古州八万洞、麻勇洞、恩勒洞、曹滴洞、衙迪洞等。见于史籍记载的“九溪十八洞”地域,在湖广、四川两行省中居然有三处之多,对其管理则是“因俗而治”。“至元二十年,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可以入官者,大者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1] 544}。州、县设置与职官任命的基础,都源于传统的“溪洞”组织。

生活于一望无垠大草原的蒙古民族,对于因高山溪流阻塞,地形复杂、地貌破碎、交通不便而形成的“溪洞”社会组织,一时难以彻底了解,《经世大典序录》的记载,充分反映了元朝对“溪洞”的认识仅限于表面程度。其文曰:“甸、砦、团、洞、箐、栅、墟、畲。岩盘川屋,激馱谿谿,山经叵究:坚、亥、斯、差,此下一字地名也。广、瑶、缥、庆,甸名。兼、我、冻、斜,州名。白、帮、上、束,团名。齿、判、粘、凹,村名。频、计、渌、在、影、雷、窖、瓢、木、茶,洞名。睢暇之州,酒涌之社,琅诩之谭,啞耸之坡。此下皆二字地名,此其尤奇者也。昵昌、瓦农、获架、必迦、苴善、抽俸、矣比、枯柯、车里、乌撒、蹉泥窝、散毛、烂土、雍真、渌查、林背、岭豚、那结、都渴、杜望、杜暮、

白定、白夺、大踢、青特、筠连、豕鹅、赤珊、蓝塞、崑骨、果夥、狰猛、瓮省、腾串、昔霞。曰九层际,此下三字地名。曰新而元、曰伽矣杰、曰百眼佐、曰水手浪、曰上落麼。师宗弥勒,此下四字地名。阿尼必鲟、一奚卜薛、阿白出麻、獬狁狁、八郎笃公、吸刺豁瞳、客客昔多。”(苏天爵《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八番顺元诸蛮》)其记载的一字族名、甸名、州名、团名、村名、洞名,二、三、四字的地名,均未涉及其地域所在,这就表明了元朝对于这些被招抚的民族群落的地理方位及辖境范围并不真正了解,因而对这些民族群落在认识上存在着模糊,释义上存在着显浅,理解上存在着迷惑。

元朝对于管辖各“溪洞”的行省或安抚司,也是常常变动不定。至元十六年,宣慰使塔海招抚了八番、罗氏等地洞寨1626处,五番等地洞寨1186处,西南番等地洞寨315处,大龙番等地洞寨360处。但对管辖这些洞寨的上级机构,却因蛮酋们所请而反复变换。“二十八年,从杨胜请,割八番洞寨,自四川行省隶湖广行省。三十年,四川行省官言:‘思、播元隶四川,近改入湖广,今土人愿仍其旧’,有旨遣问,还云田氏、杨氏言,昨赴阙廷,取道湖广甚便,况百姓相邻,驿传已立,愿隶平章答刺罕。”^{[1]1539}至元二十八年,播州杨赛因不花上言:“向所授安抚任职,隶顺元宣慰司,其所管地,于四川行省为近,乞改为军民宣抚司,直隶四川行省。”^{[1]1551}这种行政管辖的不断变动,间接证实了元朝对于各“溪洞”的地理方位、疆域范围、山川形势的认识是模糊的。而《元史》卷58《地理志·序》所载的户籍人口统计,“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更充分说明了以“图地籍民”为标志对征服地区的统治与治理,在武陵山区域并没有完全得以实现。

正因为元朝对“溪洞”的地理方位及疆域范围的不明确,在整合地方基层社会组织时,其新设的行政建制具有了“等处”的特殊命名。湖广行省管番民总管的53个蛮夷军民长官,以“等处”命名的有30个;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的24个蛮夷官,以“等处”命名的有20个;思州军民安抚司的53个蛮夷官,以“等处”命名的有21个;播州军民安抚司的32个蛮夷官,以“等处”命名的有19个;新添葛蛮安抚司的131个蛮夷官,以“等处”命名的有46个。四川行省的34个诸部蛮夷,以“等处”命名的有6个。这些“等处”命名一般由两个以上洞寨名组成,如“五寨铜人等处”“沿河祐溪等处”;多的则达5、6个洞寨,如“骨龙龙里清江木楼雍眼等处”“青塘望

怀甘长不列独娘等处”“雍门客当乐赖蒙囊大化木瓜等处”;还有的因名称太多无法一一列出,采用了从某地到某地的方式命名,如“小龙洛邦到骆豆虎等处”;有的则将一个族群概括其中,如“栖求等处仲家蛮”“雍门狁狁等处”“九十九寨蛮”。此外,还有“秦加大散等洞”“水洞下曲等寨”“洪望册漠等族”“茆难等团”的命名,将数个洞、寨、族、团以一个蛮夷官来掌管。这些以“等处”命名的蛮夷各官及各部,都是由安抚司直接控制的,如以规范的行政建制来类比,亦相当于内地的府、州、县。

其实,在诸部蛮夷中,也有府、州、县的设置,如八番顺元蛮夷官下的定远府,桑、章龙、必化、小罗、下思同等5州,朝宗、上桥、新安等11县;管番民总管下的乖西军民府,阿孟、峡江、北岛、罗那等州;思州军民安抚司的镇远府,永、福、迺、鑾、程等13州;播州军民安抚司的黄平府;新添葛蛮安抚司的南渭、福水、保靖等州。但这些府、州、县,诚如《宋史·西南溪峒诸蛮》所载:“初,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新、给、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2]14177}实际上是宋代“自署刺史”羁縻州的沿袭,与内地府、州、县有本质上的区别,仅仅是一个洞寨群落而已,故在《元史》中将其与诸部蛮夷官同列。就今天在武陵山区所遗留的来州、溪州、芷州等地名来看,其区域甚至不足以建立为一个行政村,可见当时某些州的地域范围之小,实与内地之州迥然有别。

元朝以等处、等洞、等寨、等族、等团的名称将分散的群落结为一体,其实是希望以此为基础,过渡成内地的州县。但不论是单一的洞寨,或是“等处”的群落聚集,元朝对其都没有一个大致的疆域确认,更没有明确的东南西北“四至”界定,再加上户籍人口统计,“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确定行政区划的地理及人口两基本要素均不具备。“等处”的聚集成为了区域上的“画境之制”,难以实现行政管理上的“掌土治民”。而适得其反的是,将各洞寨名称罗列于“等处”之前,无异于是在引导各洞寨自我意识感的增加,其独立性不仅没有减弱,反因多出一个同族或他族的蛮夷官,洞寨的自治性倾向更为加强。

虽然,元代对土官管辖的地域并不严格确定,但出于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对土官的行政体制系列化建构却十分重视。《元史》中明确记载了“西南夷

诸溪洞各置长官司,秩如下州。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土人为之”^{[1]2 318};“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1]1 544}的土官任用制度。其职官品级,宣慰使从二品、宣抚使正三品、安抚使正三品、招讨使正三品、诸路万户从三品、路总管从三品、知州从五品、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从五品、知县从七品等,土流不分,全国齐整^{[1]2 308-2 318}。但升迁奖惩制度,则土流有别。“土官有罪,罚而不废”,“诸土官有能爱抚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其有助劳,及应升赏承袭。”^{[1]2 635}在国家层面确定的职官体系规范统一下,既有由土官执掌的“新添葛蛮安抚司”“永顺保靖南渭三州安抚司”“师壁洞安抚司”“平缅宣抚司”“忠孝军民安抚司”“大奴勾管等洞长官司”“羊母甲洞长官司”等行政建置,也有具有地方特色的行政建置,如属四川行省的石耶洞、散毛洞、驴迟洞、新容米洞等34处洞、寨设置;属湖广行省思印江等处、洪安等处、平头著可通达等处、溶江芝子平茶等处、沿河、祐溪、五寨铜人等处、铜人大小江等处、麦着土村、会溪施溶等处、腊惹洞、驴迟洞等处计53处蛮夷官设置;播州军民安抚司之下沿河祐溪等处32洞寨蛮夷官;新添葛蛮安抚司之下南渭州、上桑直、下桑直、保靖州等132处蛮夷官等^{[1]1 539-1 562}。这就形成了以安抚司统辖各蛮夷官,蛮夷官统辖各“溪洞”的土官为主管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历元朝之世,武陵山及其

以西地区,规范的路、府、州、县行政建制始终没有建立,成为仅存安抚司管控洞、寨、等地的特殊地区。

武陵山区的土官行政建制,是一种将民族与地域混合为一体的特殊行政区划管理模式。由于作为朝廷统治象征的安抚司,仅仅通过对蛮夷酋长的控制,沿袭“溪洞”群落基层的原有社会组织形式,忽略“溪洞”群落人口的实际管理,从而导致了所谓的“诸部蛮夷”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的编户之民。由于不能对“诸部蛮夷”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为防止溪洞蛮夷的反抗,军政一体的安抚司只能长期保留,而国家规范的路、府、州、县等行政建制,则难以在武陵山区设置。这一有别于内地行政建制的长期留存,尤其是诸部蛮酋成为安抚司的实际执掌者后,“土官”的世袭自然形成,这就为元、明、清三代“因俗而治”土司制度的出现,留下了供其发展的空间。元代所设的播州、思州、永顺、保靖等安抚司,在明代都毫无例外地转化成为土司最高等级的宣慰司,显然与元代在武陵山区的土官行政建制密切相关。明代最早的“土司”出现于武陵山区,实际上也是元代“土官”势力发展壮大结果。

引用文献:

- [1]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栗世来)

Tugu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Wuling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Yuan Dynasty

LUO Zh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Hunan China)

Abstract: Tugu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established in the Wuling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Yuan Dynasty (1271—1368), w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model combining ethnic people and their reg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fusi (a kind of administrative unit) was a symbolic administrative control; the local barbarian chiefs implemented substantive autonom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Xizhou (covering some counties in today's Xiangxi regions) had integrally continued. All these had formed the basic framework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Wuling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Yuan Dynasty. This model emphasized administration unit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yet ignor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ose uncivilized areas, so the barbarians had never been legally registered. To prevent the rebels of the barbarians, Anfusi, militarily and politically integrated, had to be kept long, and this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ular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Wuling Mountainous Areas.

Key words: the Wuling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Yuan Dynasty; Anfusi (a kind of administrative unit); barbarian chiefs; cave villages